

高等学校文科教材

中国现代哲学史新编

吕希晨 王育民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高等学校文科教材

中国现代哲学史新编

吕希晨 王育民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中国现代哲学史新编

吕希晨 王育民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农安县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21.125印张 482,000字

1987年12月第1版 1987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290册

ISBN 7—206—00020—7/B·1

定价：3.70元

0619101

出版说明

本书是根据国家教委高校文科教材办公室关于《高等学校哲学类专业教材编选计划》的要求，编写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

本书初版于1984年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后，在国内许多高校受到采用，曾向国内许多专家学者广泛征求意见，特别是承蒙张岱年教授、石峻教授、任继愈教授、丁宝兰教授提出过许多宝贵意见，对于本书的修改定稿有很大的帮助。本书的修改，还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一些兄弟院校专家学者的大力帮助。

本书作为研究中国现代哲学史的第一部专著，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也可作为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专业教材。

2006/15

绪 论

一 中国现代哲学史的对象及其发展阶段

中国现代哲学史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与中国无产阶级哲学思想的形成、发展和胜利的历史，是无产阶级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反对地主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斗争的历史，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历史。研究中国现代哲学史，应该科学地揭示中国无产阶级哲学思想发展的社会基础、主要特点及其基本历史规律，深入剖析现代地主资产阶级哲学的唯心主义实质、特点及其社会作用，正确总结无产阶级哲学与地主资产阶级哲学斗争在理论思维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宣传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批判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在思想理论战线上为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

中国现代哲学史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阶段、中国无产阶级哲学的形成阶段以及中国无产阶级哲学的全面发展阶段。

五四运动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阶段。五四运动期间以李大钊、陈独秀、李达为代表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推动下，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有力地批判了封建主义与资

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宣传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潮。在哲学上，他们则比较集中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唯物史观的现代史学上的价值》，陈独秀的《马克思学说》、《答适之》和李达的《马克思还原》、《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马克思派的社会主义》等著作，在当时都有极为强烈的影响。尽管他们对唯物史观的介绍还是初步的，不是很全面的，有时甚至是错误的，然而，对中国人民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却起了启蒙的作用。其中，李大钊的贡献是突出的，他是在中国传播唯物史观的先驱。他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物质财富的生产方式决定社会的发展、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阶级与阶级斗争等基本原理，并以唯物主义的观点解释了社会历史和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他批判了那些对历史发展的唯心主义解释，认为心的变动必然受到物质环境所支配，只有求助于“物的势力”，才能真正理解历史变动的原因。他认为政治、法律、伦理等“精神构造”，都是“表面的构造”，在这些“表面构造”之下，还有“经济的构造”作基础。他的这些阐释令人耳目一新，为在我国传播历史唯物主义起到了开创作用。

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广泛传播的同时，西方资产阶级哲学也进一步传入到中国来。在中国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舞台上，首先登台表演的是胡适的实用主义哲学。他们在政治上极力鼓吹社会改良主义，在哲学上则大力兜售詹姆斯、杜威的主观唯心主义。尽管这种哲学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斗争中，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就实用主义哲学整体而言是错误的，是为其社会改良主义作论证的，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对抗的。与此同时，还出现了以梁漱溟为代表的“新儒学哲

学”。他在政治上主张维护封建主义制度，反对中国走“俄国共产党发明的路”。在哲学上则是以“反对西方物质文明，提倡东方精神文明”为号召，大力宣扬儒家、佛教和柏格森的唯心主义思想。此外，当时还发生了一场所谓“科学与人生观论战”，这是资产阶级哲学内部一种唯心主义反对另一种唯心主义的斗争。以张君勱、梁启超为主角的玄学派的“自由意志论”，反映了封建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而以丁文江、胡适、吴稚晖为代表的科学派的“感觉复合论”，则主要代表了资产阶级哲学倾向。五四时期，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同时，对地主资产阶级哲学进行了有力的批判，为清除实用主义、柏格森主义和马赫主义的唯心主义影响，传播马克思主义作出了重大贡献。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地主资产阶级哲学反映在统一战线内部的是戴季陶主义的民生哲学，反映在统一战线外部的则是国家主义派的二元论与唯心史观。他们在政治上都极力反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他们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是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政治代表。在哲学上则极力鼓吹唯心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这一时期，以毛泽东、瞿秋白、恽代英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戴季陶主义与国家主义的唯心主义哲学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并在批判斗争中坚持和阐发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基本原理。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瞿秋白的《现代社会学》、《社会哲学概论》、《社会科学概论》、《唯物论的宇宙观概说》，李达的《现代社会学》，恽代英的《唯物史观与国民革命》、《与李瑄卿君论新国家主义》等著作，都试图结合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具

体实践，阐述自己对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某些观点的初步理解，从而把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又推进了一步。《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阶级斗争的观点与方法，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全面地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地位及其发展趋势，正确地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前途等一系列根本问题，从而奠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基础。《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结合中国革命实际，系统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农民运动的伟大意义和工农联盟的重要思想，全篇自始至终贯穿着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的历史唯物主义精神，有力地批驳了在人民群众问题上的唯心史观。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阶段。这一时期的地主资产阶级哲学的主要代表，是张东荪的新康德主义与叶青的假马克思主义哲学。张东荪唯心主义的架构论、多元认识论以及他对唯物辩证法的攻击，反映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仇视。而以叶青为代表的托洛茨基派对张东荪的批判不仅没有击中要害，而且还在马克思主义外衣的掩饰下偷运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他抛出的哲学消灭论，以及他所贩卖的托洛茨基派的机械论、均衡论和折衷主义，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修正与对抗。叶青与张东荪之争只不过是唯心主义营垒中两个不同的哲学流派的斗争而已。1930年至1936年，以陶希圣为代表的“新生命”派和以任曙、严灵峰等人代表的托洛茨基派又挑起了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社会史论战。他们以唯心史观与形而上学为武器，否定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反对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为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作辩护。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张东荪、叶青、陶希圣等人的哲学思想及其反动的政治观点

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并在这一斗争中促进了中国无产阶级哲学的形成和发展。

这一时期，毛泽东的《反对本本主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的发表，以及艾思奇的《哲学讲话》和李达的《社会学大纲》的发表，标志着中国现代无产阶级哲学思想的形成，使中国现代哲学思想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反对本本主义》强调调查研究是一切工作的第一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就是尊重客观事实，并且依照客观世界的本来面目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从而为中国共产党人奠定了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理论基础。《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总结了我党领导下的十年土地革命战争的经验，阐明了人民战争的规律，为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奠定了理论基础，给马克思主义军事哲学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财富。《实践论》和《矛盾论》不仅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唯物主义的优良传统，把中国哲学史上唯物主义知行观和矛盾观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而且也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正确方向，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辩证法作出了新的发展。他以社会实践为基础，全面地系统地论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关于认识的源泉、认识的发展过程、认识的目的、真理的标准等理论，指出正确认识的形成和发展，往往需要经过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的多次反复。他阐述和发挥了关于对立统一规律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核心的理论，指出不仅要研究客观事物的矛盾的普遍性，尤其重要的是要研究它的特殊性，对不同性质的矛盾，要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能把辩证法看作是可以死背硬套的公式，而必须把它同实践、调查研究密切结合，加以灵活运用。因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

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树立了光辉的范例。《哲学讲话》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同时，尤为重要的是把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里解放出来，使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变为群众手中的锐利武器作出了贡献；《社会学大纲》比较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中国无产阶级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和理解，不仅把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而且还力图从历史的与逻辑的发展中去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史，这是前此一切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所没有做到的。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是中国无产阶级哲学思想的全面发展和胜利的阶段。抗日战争时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内以蒋介石、陈立夫为代表的唯生论与力行哲学占据了统治地位。他们在歪曲与篡改孙中山哲学思想的基础上，把中国古代思孟学派的唯心主义先验论、人性论和西方柏格森生命哲学拼凑起来，极力鼓吹直觉主义与蒙昧主义，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封建法西斯主义统治制造舆论准备。这一时期“影响最大，声名最大”的还是以冯友兰为代表的新理学与以贺麟为代表的新心学，他们是中国现代新儒学哲学的主要代表。冯友兰新理学从唯“理”论的客观唯心主义，走向“同于大全”的主观唯心主义，贺麟主张新心学的心学本体论、知行合一论，并对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有所贬抑。他们力图克服封建传统哲学的素朴性，努力跟上世界资产阶级哲学发展的脚步。然而，他们都主张用新儒学哲学代替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中国现代社会的发展是有消极作用的。这一时期以陈铨、林同济为代表的战图策派，则是国内外法西斯主义哲学的代言人。他们反对五四以来的科学与民主精神，主张对外实行侵略对内实行独裁。在哲学上则极力提倡唯意志主义、天才论与英雄史观，为法西斯主义

的侵略战争与蒋介石集团的独裁统治提供哲学依据。至于以熊十力为代表的新唯识论，主要是反映了地主资产阶级一般的哲学思想倾向。他把中国传统儒学、佛教法相唯识之学和西方柏格森的直觉主义融为一体，特别是发挥了《周易》、《老子》和陆王心学的思想，提出了唯心主义心本论思想体系，他的体用论与翕辟说虽然也发挥了某些辩证法思想，但又为其唯心主义思想体系所束缚。新唯识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说成是“俗计”、“妄见”，主张以新唯识论代替无产阶级的科学真理，显然这是错误的。

这一时期，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与战略问题》、《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人为什么犯错误？》等一系列哲学著作，不仅对国内外哲学战线两条路线的斗争作出了新的理论概括，而且也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全面系统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是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一个成功的范例。它不仅丰富和发展了无产阶级的军事科学理论，而且也为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革命原则作出了榜样。《论持久战》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全面地考察了中日战争的基本特点，分析了战争的性质和取得胜利的条件，批驳了亡国论与速胜论的错误观点及其认识论根源，科学地预见了战争的进程、趋势和前途，提出了一整套指导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和战术原则。《战争和战略问题》既是指导抗日战争的强大理论武器，也是研究战略战术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军事哲学著作。它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分析了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指出马克思主义武装夺取政权的普遍原则，必须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坚持辩证法的发展观，必

须使军事战略原则随着敌我双方情况的变化而转变。《新民主主义论》是一部具有丰富哲学思想的重要著作。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科学地总结了近百年来特别是1919年以来的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全面地阐明了中国革命的特点，深刻地揭示了中国革命斗争的基本规律，发展了马列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思想，提出了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划分为新旧两个历史范畴，系统地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并明确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思想。《论联合政府》论述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通篇贯穿着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精神，体现了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它标志着毛泽东哲学思想更加成熟，有了新的发展。

三年解放战争时期，资产阶级哲学出现了相对沉寂状态，只有资产阶级的所谓中间路线活跃一时。他们对抗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企图在中国建立英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在哲学上则极力鼓吹矛盾调和论与中庸之道，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与阶级斗争的理论。与此同时，美帝国主义侵华势力在面临彻底失败的形势下，又抛出了所谓《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的白皮书，对抗中国历史发展和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散布了一系列颠倒黑白的历史唯心主义谬论。对此，当时以毛泽东、郭沫若、潘梓年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进行了有力地批评。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飞快发展，中间路线倡导者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幻想，被革命的现实所摧毁。美蒋反动的唯心史观也随着蒋介石反动政权的迅速垮台，宣告彻底破产。

这一时期，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唯心史观的破产》等许多著作，对美

蒋反动派所鼓吹的历史唯心主义进行了彻底的清算，并且在批判中继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论人民民主专政》总结了我国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规定了即将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性质及其对内对外的基本政策，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为在我国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丢掉幻想，准备斗争》运用和发挥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阶级斗争学说，彻底揭露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指出对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不能存在幻想，“唯一的办法是组织力量和他们斗争”。《唯心史观的破产》有力地批判了美蒋反动派和所谓民主自由主义者的历史唯心主义，驳斥了他们在中国近代文化史方面的种种谬论，阐明了只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才能救中国，只有人民群众才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

从1919年的五四运动到194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这短短的三十年的时间里，马克思主义哲学一经被中国人民所掌握，就产生了伟大的物质力量，使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胜利。从此以后，中国无产阶级哲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二 中国现代哲学史的主要特点

第一，中国现代哲学史的阶级基础，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把无产阶级作为自己的物质武器，一方面是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则把地主资产阶级作为自己的物质武器。前者是促进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的政治势力，它的要求同社会发展规律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后者则是中国最落后和最反动生产关系的代表，它严重地阻碍着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中国现代无产阶级哲学是在传播马克思主义与批判地主资产阶级哲学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也是在改造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因此这种哲学就充分显示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性和阶级性的特点。它不但旗帜鲜明地为无产阶级及其革命斗争服务，而且对地主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在斗争中逐步建立并完善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列宁说：“马克思认为他的理论的全部价值在于这个理论在本质上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后一品质真正是马克思主义完全地和无条件地所固有的，因为这个理论公开认为自己的任务就是揭露现代社会的一切对抗和剥削的形式，考察它们的演变，证明它们的暂时性和转变为另一种形式的必然性，因而也就帮助于无产阶级尽可能迅速地、尽可能容易地消灭任何剥削。”①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无产阶级服务，这正是无产阶级哲学的本质属性所在，中国现代无产阶级哲学充分地显示了这种阶级性和实践性的特点。

与此相反，中国现代资产阶级哲学以地主资产阶级作为它的阶级基础，这就决定了它必然破产的命运。因为中国的封建地主阶级早已成为历史上的腐朽势力，这种腐朽势力经过辛亥革命，特别是经过伟大的五四运动，已经完全堕落成为中国最反动最落后生产关系的代表，严重地阻碍着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至于中国的资产阶级，由于它处于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中国，在政治上也完全丧失了进步的和领导的作用。如果说五四运动以前，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领导者是小资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话，那么五四运动以后，虽然民族资产阶级继续参加了革命，但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领导者，已经不属

①《列宁全集》第1卷，第305页。

于资产阶级而属于无产阶级了。中国资产阶级，特别是大资产阶级的生存与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是极端的反革命派。

“中国的大资产阶级，以国民党为代表，在1927年至1937年这一个长的时期内，一直是投入帝国主义的怀抱，并和封建势力结成同盟，反对革命人民的。”至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即使在革命时，也不愿意同帝国主义完全分裂，并且他们同农村中的地租剥削有密切联系，因此，他们就不愿和不能彻底推翻帝国主义，更加不愿和更加不能彻底推翻封建势力。”因此，“在欧美各国，特别在法国，当它们还在革命时代，那里的资产阶级革命是比较彻底的；在中国，资产阶级则连这点彻底性都没有。”^①中国资产阶级这种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异常软弱性和对于革命敌人的妥协性，说明这个阶级在中国是没有发展前途的阶级，因而依附于这个阶级身上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哲学也肯定是没有发展前途的。

第二，中国现代哲学史的理论形态，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优良传统相结合，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一方面则是西方资产阶级哲学与中国封建主义哲学相结合。前者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是无产阶级领导广大人民群众改造旧世界，建设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社会最锐利的思想武器；后者是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哲学，是为在中国建立资本主义制度进行辩护的反动思想工具。两种结合的对立反映着哲学战线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尖锐斗争。

中国近代哲学史就其实质来说是中国人民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历史，然而五四运动以前的七十年间，中国人民并没有找到指导自己正确前进的科学思想武器，只是到了五四运动以

^①《毛泽东选集》，第634—635页。

后，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并且建立了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准备了阶级的和社会的有利条件。马克思主义哲学一经与中国革命的历史与现状相结合，特别是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就形成了带有中国民族特点的中国无产阶级哲学，即毛泽东哲学思想。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根本点，就在于它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与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革命精神。这种革命精神充分反映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辩证法与唯物史观的统一，充分地显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性与阶级性的特点。中国人民正是在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指导下，才在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不断取得胜利。

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是为了革命实践的需要，是为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毛泽东指出：“在这种态度下，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①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传播与发展马克思

^①《毛泽东选集》，第759页。

的事实，所以我们在第（三）教训内可以学得创造历史之最有效最根本的方法，即经济制度的革命。照我这样解释，马克思主义并没有什么矛盾。若是把唯物史观看做一种呆板的自然进化说，那末，马克思主义便成了完全机械论的哲学。”^①在这里，陈独秀阐明了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与社会革命不仅不矛盾，而且还可以互相证明。经济的发展是社会革命的根本原因，社会革命是改造经济制度的主要方法，否认社会革命的作用，把唯物史观看成是一种呆板的固定的自然进化论，那末，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就成了机械论的哲学。陈独秀的这些论述基本上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观点，澄清了当时思想界对唯物史观的一些模糊认识。

陈独秀还认为，阶级与阶级斗争的理论也是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他看来唯物史观与阶级斗争说是“打成一片”的。“一切过去社会底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底历史。例如在古代有贵族与平民，自由民与奴隶；在中世纪有封建领主与农奴，行东与雇工；这些压制阶级与被压制阶级都是自来站在反对的地位，不断的明争暗斗。封建废了，又发生了近代有产者与无产者这两个阶级新的对抗，新的斗争。”又说：“近代产业发展的结果，一般小资产的小商人小工业家，一方面因为他们的专门技能为新生产方法所压倒，一方面因为他们的小资本为大规模的产业所压倒，都不断地降到无产阶级。可是一方面产业愈加发展，一方面无产阶级不但人数愈加增多，而且渐次集中结成大团体，因为生活不安，对于有产阶级渐次增长阶级抵抗的觉悟，发生争斗，始于罢工，终于革命”。因此，“有产阶级之倾覆以及无产阶级之胜利，都是不能免的

^①《通信》。《新青年》第9卷第4期，1921年8月1日。